

【主持人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众议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 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作为国家重大战略目标。本专题通过3篇文章从多元视角探讨这一主题。文章1指出: 中文是当今新时代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基石, 在文明互鉴与文明传承中起着重要作用; 第二次“东学西渐”对东西方文学文化交流史有着深远影响。文章2认为新时代中国诗歌的英文翻译在中西文明互鉴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标志着中国诗歌异国传播的新辉煌。文章3分析了当代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传统哲学、古典文学和民俗艺术的新叙事风貌和美学特质, 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传播中的新价值。3篇文章相辅相成, 共同构建“语言纽带+翻译先行+文化传承”三位一体的研究图景, 期待为推动新时代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贡献学术力量。

中文与文明互鉴 ——也谈第二次“东学西渐”

陈众议^{1,2}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2. 湖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 第二次“东学西渐”源于我国四大发明, 始于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 涵盖公元8世纪至今的一千多年东西方文学文化交流史, 也彰显中文及其包含的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作为文明互鉴重要载体的功能。马克思主义唯物语言观和语言文字产生的历史逻辑对人们理解中文的会意性、象征力和无所不能的超级魔方效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作为中华民族语言和文学的集合体, 中文及其承载的中华文化精神是筑牢中华文化的最强大的稳定剂和粘合力, 确保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稳定延续。文明互鉴与文明传承一样, 其关键是语言文学, 其目标是天下大同。

关键词: 中文; “东学西渐”; 文明互鉴; 语言文学; 大同理想

中图分类号: H0-05; I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5)06-0562-06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41101568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Mutual Learning of Civilizations —On the Second Scale of “East to West”

CHEN Zhongyi^{1,2}

(1.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Beginning with the Translation Movement, the Second Scale of “East to West” originated from the four great inventions of ancient China and covers over a thousand years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since the 8th century. It also highlights the function of Chinese

收稿日期: 2024-11-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284)

第一作者: 陈众议, 男, 教授。研究方向: 西语文学、文艺学研究。E-mail: chenzhy@cass.org.cn

language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as well a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Marxist views of language and the historical logic for language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eople to better understand Chinese with its meaning, symbolism and omnipotent super Rubik's Cube effect.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the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 are the strongest stabilizers and bond forces to strengthen Chinese culture, ensuring the stable continu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or five thousand years. Therefore, just like inheritance of civilizati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re the key to mutual learning of civilizations, achieving the goal of universal harmony.

Keywords: Chinese; the Second Scale of "East to West"; mutual learning of civilization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deal of the Great Unity

文明互鉴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无论主动还是被动，“轴心时代”及其前后，东方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古波斯、古希伯来对古希腊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广义和狭义文化层面俯拾即是，后世可以从语言文学和宗教历史等维度对此进行高度概括。然而，随着近现代西方中心主义的盛行，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被有意忽略。从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有关著述进行了举证和清算，但这仅仅是开始，而且是晚近之事。事实上，即使从中古至近现代，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古国对西方的影响也远未被正视。因此，重新发现和阐释第二次“东学西渐”至少可以涵盖从公元8世纪至今的一千多年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其中，语言文学功不可没。

一、第二次“东学西渐”与文明互鉴

公元8世纪，发生了两件改变世界历史走向的现象级大事件：一是阿拉伯人于711年登陆欧洲，以摧枯拉朽之势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和今意大利的撒丁岛、西西里岛等广袤地区；二是阿拉伯人在我大唐西域骚扰并于751年在今哈萨克斯坦（一曰吉尔吉斯斯坦）发动战争，是为怛罗斯之战。后者持续一月有余，最终因唐朝边关守将葛逻禄叛变而告终。大唐军队败北，八万余（一曰十万余）大唐军民被阿拉伯人俘获，其中包括大量能工巧匠。虽然“丝绸之路”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但我国“四大发明”被精准传播至欧洲却是在怛罗斯战役之后。在被阿拉伯人俘获的数量可观的我国工匠之中，既有火药和指南针制作者，也有造纸和印刷技工。适逢阿巴斯王朝取

代伍麦叶王朝，这些人才被悉数带到撒马尔罕和巴格达。正是因为他们，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才成为可能。规模远超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智慧宫”也在“百年翻译运动”中应运而生。

“百年翻译运动”是阿拉伯人对东西方古典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其中包括被西方遗忘的古希腊罗马经典。也正是在阿拉伯人向西方传播印度数学时，欧洲人才有了零的概念。至于后来的航海大发现，其技术基础是我国的指南针，其理论基础则来自阿拉伯学者阿格哈尼（Al-Farghani），后者最早提出了地圆说。这不仅影响了哥伦布，而且同样启发了哥白尼和伽利略。用哥伦布的话说：只要一直向西，帆船就能抵达中国和印度；遇到顺风，则航程仅需两周时间^[1]。恩格斯认为，西方通过阿拉伯人重新发现了希腊哲学，并为18世纪的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他说：“在罗曼语各民族那里，一种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从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开朗的自由思想，越来越深地扎下了根，为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2]当然，不仅仅是哲学。早在20年前，笔者应《人民日报》之约，写过一篇题为《点燃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之火的东方人》，文中回顾了东方文化经由阿拉伯人西传的过程。除了翻译古希腊罗马经典，阿拉伯人将印度数学转化为代数。西方“algebra”一词便源自阿拉伯语（al-jabr）。简明的阿拉伯数字加上先进的印度算法，大大促进了西方在数理领域的发展。此外，阿拉伯人还在医学、科技、军事、哲学、文学、经济（如财会、税务）等领域为西方注入了新的动能。

因此，没有我国的“四大发明”，就没有阿拉伯世界的“百年翻译运动”，当然也不可能有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更不可能有15至16世纪

的航海大发现。至于后来的启蒙运动,则明确借鉴了我国古代哲学,而《萨贡达罗》《五卷书》等印度文学作品和《玉娇里》《好球传》等我国才子佳人小说传入欧洲,也为歌德倡导“世界文学”提供了可能:不同民族通过文学来相互交流和彼此了解。“惟其如此,才会出现普遍的世界文学;各民族了解所有民族间的关系,这就不可避免,一个民族会看到别的民族的令人愉快之处和令人反感之处,值得学习的方面和应当避免的方面。这也会对日益频繁的工商业活动大有裨益,因为有相同的理念,就会有更快、更深的信任。”^[3]

在文学方面,有关例证良多。这是因为文学是人心的外化。诚所谓“君子九容,以情动人”(《礼记·玉藻》),文学便是九容华章,情之广厦,最可“兴”“观”“群”“怨”,以情动情,是为共情。正如刘勰所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文心雕龙·序志第五》)也如钱锺书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4]且说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给欧洲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歌谣,其韵律填补了东哥特和西哥特因宗教文化留下的巨大世俗文化的空白。同时,伊比利亚半岛、今意大利城邦和比利牛斯山北麓的普罗旺斯歌谣也被迅速催化,改变了罗马诗歌的无尾韵传统。与此同时,罗曼司俗语歌谣又反过来影响阿拉伯诗歌,催生了被誉为如彩似锦的“彩锦诗”或“彩诗”。后者作为一种崭新的诗体,几乎同时推动了南欧和阿拉伯本土诗坛的革新。无论题材还是格律,“彩诗”都是西方和阿拉伯文学的一大进步,融合了两种文化的世俗价值取向和审美感悟。此外,阿拉伯流浪汉小说“玛卡梅”直接影响了西方流浪汉小说的萌发^①。小说都采用第一人称,出发点是“现在”和现在时,“过去”只不过是用来说明“现在”的前因。西方第一部流浪汉小说《小癞子》前言里写道:“我请求您大人接受我这点小意思;只恨力不从心,不能写得再好。您叫我把自己的事仔细向您叙述,所以我认为不从半中间起,最好从头讲来,让您能看到我的全貌……”^[5]这个“您大人”只是佚名作者的托词,既是作者为了“取信于人”而设计的,也是沿袭了阿拉伯人的习惯:将作品献给达官贵人,以求庇佑。于是,风气使然,塞万提斯对时人的这套做法虽颇有微词,但也不不得不在其作品前恭恭敬敬地写上献词。

这样,《堂吉珂德》献给了贝哈尔公爵和诸如此类的一些达官贵人。当然,影响最大的要数寓言故事集《卡里来和笛木乃》和《一千零一夜》。前者来自印度《五卷书》,后者是对波斯同名文学作品的敷衍和再造。《卡里来和笛木乃》的很多故事进入了西班牙中古文学,其中在西方产生连锁反应的有《真爱之书》和《卢卡诺尔伯爵》。譬如《驯悍妇》和《皇帝的新装》分别为莎士比亚喜剧和安徒生童话提供了故事素材。至于《一千零一夜》这一阿拉伯文学瑰宝,滋养了不知多少文豪。例如:16世纪西班牙文豪洛佩·德·维加的《少女特奥多尔》来自《一千零一夜》第436至439夜《陶望督督的故事》;17世纪剧作家卡尔德隆的《人生如梦》采撷了《一千零一夜》第389夜中的《迷醉之人》。而横跨16、17世纪的塞万提斯在《堂吉珂德》等作品中不断委婉地留下“夫子自道”,甚至以戏谑的方式表达了他对阿拉伯人的敬意,称《堂吉珂德》的作者“是阿拉伯历史学家贝南赫里”^[6]。此外,除了暗指桑丘和杜尔西内娅有“摩尔”血统,还“无端”插入了两个故事,一个是第一部第三十三至三十四章的“无事生非的故事”,另一个是第一部第三十九至四十一章的“战俘的故事”。这两个故事与《堂吉珂德》毫无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它们无疑是受了《一千零一夜》嵌套结构的影响。要说塞万提斯是剧作家出身,剧作最忌多线并列、齐头并进。在哈罗德·布鲁姆等诸多西方学者和作家看来,塞万提斯是现代小说之父,他假借堂吉珂德和桑丘的交互影响改变了现代小说的路径和经典的本质^[7]。这种交互影响不正是对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艺术呈现?

二、中文和当代中国文化精神

当代中国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两大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

^①仲跻昆在《阿拉伯现代文学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中提到了阿拔斯朝的流浪者故事中“玛卡梅”对西方流浪汉小说的影响;宗笑飞则通过平行比较和详实的资料论证了流浪汉小说与“玛卡梅”小说的关系(见《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与西班牙文学之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7)。

当代中国文化精神的高度概括。

今天，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与迭代更新，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如钱江大潮滚滚而来。它与广义和狭义文化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位与反转。一方面，它是人类进入21世纪最具标志性的科技成果，另一方面也正在改变数千年人类文明的渐进模式，即以大数据和大模型创造一个与人类传统文化样貌和生活方式平行且有可能反噬和覆盖前者的亦真亦假、亦实亦虚的光怪陆离的世界。与此同时，当今世界，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及零和博弈抬头，全球局部地区的战火正旺。如何规避风险、避免毁灭性灾难？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们应当相向而行，未雨绸缪，求同存异，休戚与共。

跬步千里，积微成著。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8]其中的关键词当可概括为连续性和生命力、主体性和中国心（也即人心根基、家国情怀）。

（一）连续性和生命力

关于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关键词，四书五经和历代经史子集已经说得很多。譬如《周易》中的阴阳虚实辩证和“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笔者想强调的是使中华文化得以延续和生生不息的中文。中文是世代代中华儿女的共同创造，它承载了所有狭义和广义的中华文化并使之发扬光大。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说过，他们之所以没有留在欧洲，也没有去台湾的唯一理由是中文，因为中文的根在大陆。从浩如烟海的图书，到不断发现的简帛，中文令人叹为观止。

首先，中文是全中国各民族共同的财富、共同的创造，是古来盛世像统一度量衡一样有意化

合、协和的产物。语言作为思维、想象、记忆和交际的原动力和原载体，是一切物质和精神生产的第一要素。因此，除了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认为乡土筑牢了中华文化并将我们“束缚”，笔者还必须强调中文这个更大更强的稳定剂和粘合剂。没有中文，也许我们早就被“化”了。语言的被化恰恰是其他几个古老文明断裂的主要症结所在。试想，如果不是因为中文的海纳百川，及其固有的、无与伦比的辨识度、会意性、象征力和无所不能的超级魔方效应，那么即使它没有被辽化、金化、蒙化、满化，也难免被拉丁化。拉丁化正是一些围绕在《新青年》周围的激进派所鼓吹的。鲁迅在《阿Q正传》序言中有过这样的检讨：“写他为阿Quei，略作阿Q。这近于盲从《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9]同时，他说中文有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10]我这里之所以要说“中文”而非“汉字”，也是出于文化互鉴和民族融合的缘故。“汉字”哪里是汉人的独创？其分明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创造与财富。且不说汉语和藏语同属汉藏语系，古来从北到南、自西至东，我国有关民族语汇融合的例证和研究成果不胜枚举。

其次，语言的生成和发展是有规律的。它至少经历了肢体语言、声音语言和表意符号三个阶段，尔后形成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方式，并为国族文化奠定了基础。文化藉由语言文字以承继和流传、创造和鼎新，这毋庸置疑。同时，语言的发展机理固然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原始氏族和历史演化等复杂关系，但它作为民族认同的情感交流和思维、想象、记忆平台，以及民族文化、价值取向和审美习惯等的重要载体，谓基因固可，谓染色体亦无不可。在马克思看来，语言是意识形态。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使宗教丧失了精神主宰的地位。但资产阶级的所谓“博爱”却继承了宗教精神，尽管其伪善性与生俱来。一则，自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核心内容，它以个人权利为基准，及至发达资本主义普遍奉行的帕雷托“二八率”。二则，“博爱”不仅赋予语言和宗教以情感色彩，而且批判地继承了宗教精神，并将其逐渐完善为人道主义，这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西方文艺作品中被逐渐确立为主旋律。宗教精神和人道主义虽然

有神本和人本之别,但内涵却皆为一个“爱”字;况且神归根结底也是人造的,一旦作为精神安慰,而非政治组织(及其相应的机构和权力、财富诉求等),那么其本质诉求几可与爱具有理论上的等值效应,尽管资本主义并不能真正维系这种等值效应。

中外历史证明,在文艺创作中,“入世”和“出世”、“介入”和“超逸”并不构成两对矛盾,关键要看为什么“入世”或“出世”,为什么“介入”或“超逸”。这就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伦理价值。这一经验不只是深刻体现于我国的众多文艺经典,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至今的文艺经典也都体现了这些屡试不爽的法则,尽管西方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背面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8]正因为如此,“天下兴旺,匹夫有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文传统。问题是,市场经济的商业原则、资本逻辑一旦渗透到文化领域,就会对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造成持久的,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

再次,同样一个“以人为本”,也存在着不同的基准,其侧重则因时而异、因人而异,譬如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暂时与长远的关系、内部与外部的关系等,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特别说明的是,西方这种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与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由此形成的文化狂欢景象则是其必然结果,它不仅无损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散,而且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去传统化”“去中心化”“去民族化”的催化效果。但我们要坚持的恰恰是集体主义的民族传统、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这较之“自然而然”的跨国资本主义要艰难得多。也就是说,多元文化论在当今西方实则是跨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论,

其狂欢景象有利于资本的自由游移,即虚伪的“国际化”和真实的利益最大化。是故,一旦发展中国家崛起,华尔街及其代理人便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单边主义、小团体主义,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既需要守护民族传统以凝聚力量,又需要依靠市场经济以发展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甚至还需要超前地守望共产主义理想的国家无疑是巨大挑战。

然而,没有文明互鉴,中国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化是无法想象的。因此,问题不在于文化交流,而在于如何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被同化。这就牵涉到我们的同心圆够不够大,有没有心。

(二) 主体性和中国心

主体性和中国心也即人心根基、家国情怀。这些都根植于我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侠义文化。一如数理化不分家,文史哲不分家同样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文学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其与语言的关系犹如灵魂和肉体。因此,文学不仅是消遣和情感交流的工具,也是民族的审美对象和集体无意识表征;历史也不仅是记忆,而且是社会的发展过程和物质生产、社会交往,甚至和文学一样是我们集体意识、家国情怀的主要来源;哲学更是进入了“101计划”优选学科。需要强调的是,当我们在诵读唐诗宋词时,鲜有不在内心产生家国情怀的,这是由于优秀的语言文学与民族心理之间难分难解的亲缘关系。盖因文学归根结底是民族理想与情感、价值与审美等多重精神要素的结集。其中,中文永远是最大的传统。当下我们面临的问题诸多,比如,从幼儿到研究生,语文教育退化严重,以至于文科博士生不擅写作,更遑论文采飞扬。于是,有的家长将孩子关在家里学习《三字经》《千字文》以及四书五经等,意图通过恢复“私塾”来弘扬“国学”。殊不知人类是群居动物,孩子更需要集体,这就陷入了可怕的两难境地。

再说文学的秘诀,或可称之为文心者,往往首推情感。情感乃人类最高级的生命体验,犹如太阳,让审美、意义、价值、伦理、修辞等一众行星远近环绕。一切生灵的是非好恶、喜怒哀乐皆在经意和不经意中服从于她。无论是怦然心动、毛发森竖,还是喜极而泣、潸然泪下,抑或是辘

转反侧、夜不能寐，均为“有感而发”。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大抵都是有感而发。那么文学批评呢？是否也应该有感而发，带着脉动、体温和风骨？

怪谲的是现代西方文论鲜有关注读者情感诉求的，即或有也已然被林林总总“高大上”的主义和后主义所掩埋。一个执着于文学“教育”的文本细读或一些致力于叙事形式的作品解读，恐怕会容易抹去情感作为审美核心的亘古逻辑。当然，文本细读和叙事形式并非不重要，但必须服从文心的需要。诚所谓文无心不美、无情不丽，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写道：“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钟嵘在《诗品·序》中也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惊天地、泣鬼神的前提是诗文有情有魂。若非如此，文心不能如阳光般晖丽万物，烛照天、地、人。这正是察人文化成天下以及“兴观群怨”“陶熔诱掖”“熏浸刺提”的由来和所往。此外，有容乃大历来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精神维度。中华情更是自古博大，从亲情、友情、爱情、侠情到协和万邦，中华民族从不侵略和压迫其他民族，成吉思汗的子孙一俟融入中华文化也再没有侵略和压迫过其他民族。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一个“和”字。正如满族同胞在故宫的高度概括：太和（殿）即天人之和，中和（殿）即人人之和，保和（殿）即人己之和。

三、结语

中文之妙，妙在承载中华文化，铸造中华文明。文明因互鉴而扬长补短、丰饶充盈。两次大规模的“东学西渐”姑且不论，单说从“百日维

新”到五四运动再到改革开放，几代外语人才不仅引进了德先生、赛先生，而且还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我党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悠久文化相结合，反哺和丰富了中华文化，使之焕发出令全世界刮目的灼灼光辉。如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仗文史哲等为核心的人文社科，否则，具有中国心的大数据、大模型无从谈起。因此，我们必须在固本的同时，以协和万邦的胸怀拥抱世界，创建具有大同精神的大数据、大模型。中华民族的协和精神和大同理想，应像中文无与伦比的辨识度、会意性、象征力和无所不能的超级魔方一样得到彰显和传播。

参考文献：

- [1] MENÉNDEZ PIDAL R. Cómo hablaba colón[J]. Revista cubana, 1940(14): 5 - 9.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10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 方维规. 论世界文学与全球化的结构性关系[J]. 探索与争鸣, 2024(6): 13 - 16.
- [4] 钱锺书. 谈艺录·序[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 [5] 杨绛. 杨绛文集(第八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6] CERVANTES M. 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M]. Madrid: Real Academia Española, 2004.
- [7] BLOOM H.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94.
- [8] 环球时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天下为公[EB/OL]. (2024-06-02)[2024-10-10].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0719976267504030&wfr=spider&for=pc>.
- [9] 鲁迅. 鲁迅全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10] 鲁迅. 鲁迅全集(第9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责编: 朱渭波)